

想起你，我们更热爱这片绿土

□谭 楷

杜鹃声中的4月，总是让人怀旧与思念。雨后初晴的一天，我和几位朋友颇费周折地走进了秦岭深处的三官庙，去为长眠在那里的曾周扫墓。

三官庙属于中国野生大熊猫密度最大的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一路上都能拾到新鲜粪团，看到采食后残留的竹荪子。由于不通公路，我曾两次走到凉风垭，因大雪封山，只好爬上瞭望塔望“庙”兴叹。这一回，经过三个小时骑马和攀爬，我们汗流浹背来到三官庙保护站。

刘小斌站长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位中年壮汉已经在野外工作了27年，是保护站的第6任站长。听说我们要为曾周扫墓，他便提起一把砍刀说：走吧！

粉嫩的野樱花，淡金色的山茱萸，刚打红骨朵的高山柳，还有不知名的野花，随便砍几下，一大把秦岭春色就足够编成斑斓的花束。

从保护站到曾周墓地，约600米。一路走着，我的脚步渐渐沉重。整整30年，为曾周扫墓的愿望，在我心中深藏了30年！

曾周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刚考上研究生，便跟随潘文士教授来到三官庙，为跟踪大熊猫迷了路，摸黑夜行时在三星桥附近坠下百米深崖。他的手摔碎了，生命停止在1985年4月17日20时10分。书包里，有刚拾到的熊猫粪团，笔记本刚写下：4·17，黑梁沟有巴山木竹分布……21岁的曾周，实在是太年轻了，一切才刚刚开始，又戛然而止。

也许，无情的时光会抹去许多记忆，甚至忘了曾周是为大熊猫保护事业献身的第一人。但有个历史的瞬间，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1984年的国庆游

行，天安门前亮出了“小平你好”的横幅。曾周不仅参与了横幅的策划和制作，还在同学的“掩护”下，和郭建嵘共同把横幅夹带在身，不动声色地干了一件让世界瞩目的事儿。追根溯源，曾周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因一顶“右派”帽子而受尽屈辱。父子俩终于熬到苦尽甘来的一天。“小平你好”喷发出亿万中国人民的情感，也浓缩了两代人心中的千言万语。

1986年，在汉中召开的全国保护大熊猫大会上，我见到了曾周的父亲。他的大会发言令人潸然泪下，以至于在见面时，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那是一双泪水干涸，痛苦得不知什么是痛苦的眼睛。他说，我和曾周是父子，更是挚友。我理解他。

之后，我获悉，曾周的父亲曾几次来到三官庙扫墓。最后一次是20年前，由保护工作者张陕宁和党高弟陪同，爬上三星桥附近的陡坡，在曾周断魂之处伫立。张陕宁哽咽着说：老爷子啊，你要节哀。党高弟紧挽着他，生怕有闪失。他却挣脱了党高弟的胳膊，双手拱成一话筒，对着大山喊道：周周，爸爸来看你了！爸爸老了，以后就来不了啦……

党高弟对我说，想不到一个瘦小的老人，能发出那么洪亮的声音。群山在呼应，把他的喊声传得很远很远。

那喊声，一直在我心中回响。72岁的我，终于实现了夙愿。

曾周墓在一条巡山的小路旁。几棵伟岸的华山松守护着一座不大的坟冢，坟前有一块墓碑，由佛坪自然保护区建立。

我们献上花束，向曾周默哀，敬礼。我对曾周说：曾

周，从见到你的父亲那一天起，我就想到三官庙来看你。我们是从未谋面的忘年之交。曾周，我要对你说，你献身的大熊猫保护事业，已经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参与。前一段结束的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由上千名“80后”、“90后”年轻人担纲，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还有在5·12大地震中痛失亲子的年轻的父亲。他们不畏惧冰雹、骤雨、大雪、激流、险滩、泥石流，一次次走过了刀背岩、钻天坡、迷魂沟、雪门坎……历时3年，终于查清了野外大熊猫数量，比第三次调查增长了16.8%，达到了1864只。看到勇往直前的年轻人，我总会想起你。30年来，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曾周啊，你应该感到欣慰！

巡山路上，传来脚步声。三个身穿迷彩服的小伙子跟我们打招呼。他们个个脚步矫健，锐气逼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佛坪保护区内，先后发现了7只棕色大熊猫。谁能说清楚秦岭的深山老林，隐藏着多少自然之谜？这个世界，一直在倾听着青春的足音。

返回保护站的路上，我们反复念叨着曾周墓碑上那一行碑文：想起你，我们更热爱这片绿土！

夕阳下的山林一片辉煌。在百鸟的合唱声中，分明能听到杜鹃“归——归——”的叫唤。刘站长说：低山的杜鹃花才开放，过不了几天，满山开遍杜鹃花的时候，才叫美呢。

我们伫立在保护站的石阶上，听“归归归——归——”的啼啼声在山谷中回荡，真是惊心动魄。

不远处，闯过了无数隘口与坎坷的东河，雪浪奔腾，在唱着永不回头的歌。



老 街(油画) 张克慧 作



■纪念 为文学守望终生 ——缅怀老诗人杨文林 □陈德宏

2015年7月14日上午11时，为文学守望终生的老诗人杨文林的心脏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停止了跳动。

他走得太突然，突然得毫无征兆，因此我也毫无思想准备。在他入院抢救的前3天——6月30号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还声音洪亮，底气很足，谈笑风生。怎么说就走了呢？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吗？

电话中我告诉他，顾骧的小女儿顾莘在中国作协领导的支持下，计划出一本纪念顾骧的文集，让我代她约稿，请顾骧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撰写文章，寄托哀思。他是我第一个考虑约稿的人。他有些犹豫，说近来很难集中精力。最终他还是同意写稿，不过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时间上要宽限，二是回兰州再动笔。我知道，不是我说服了他，是顾骧同他数十年的友谊感动了他——他说，1985年夏，到新疆伊犁参加“西部文学研讨会”，会后他同顾骧等五六位好友，在陈伯中、都幸福陪同下，遍游新疆，登帕米尔高原，直至中巴边界处的红旗拉甫山口。

我还劝他别回兰州，我说，养老还有比跟女儿在一起更好的吗？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啊！他还是执意要回。他说，甘肃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学习成长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回到兰州我就感到舒服。为了强调他回兰州的决心，还吟诵了两句古诗：京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接着便是朗朗的笑声……

叶落归根——回想起来，难道这就是老诗人给我的暗示吗？

4年前《杨文林诗文集》诗歌卷《北草南花》及散文卷《陇头水泊》出版，恰逢老诗人八十寿诞，我写下了如下文字：“这哪里是普通的诗文集啊！它分明是杨文林一个甲子的文学情缘，是他汗水、心血与智慧的结晶，是他文学圆梦的记载与见证，是他生命的火焰。”

没错，杨文林是视文学为生命的，这两本集子的成书过程，就足以成为鲜明的例证。就诗文集的素材而言，是他数十年的生活积累，而写作成书却是近10年的事，也就是说真正把素材加工提炼成作品，是在他脱离开纷繁的文学领导岗位之后才动手完成的。对一般人而言，这正是含饴弄孙、安度晚年阶段，而他却为圆文学梦，青灯伏案，孜孜以求。此情此景，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杨文林所钟爱的文学创作，几乎被他所竭诚投入的卓有成效的文学组织活动及编辑工作所淹没。对于80岁时出的这两本诗文集，他深感欣慰，笑言是补交的“落下的作业”。

杨文林与文学一生有缘，早在1948年，不满17岁的杨文林就在兰

州的《民国日报》与《和平日报》上分别发表了他的诗歌与散文的处女作；之后，他于1949年8月，参加了集结于他家乡临洮准备解放兰州的第一野战军。那时的部队，中学生即是文化人，何况还有作品发表。经过短暂的培训，他成为部队的新闻及文化工作者。由于他的勤奋，在上世纪的50年代初，不断有诗作在全国性报刊发表，成为小荷渐露尖尖角的军旅诗人，受到诗坛瞩目，特别是受到李季、闻捷的青睐。动员他转业来《飞天》（当时刊名为《红旗手》）。从此，在甘肃文坛风风雨雨耕耘几十年。

对甘肃当代文学60余年的发展，与繁盛的贡献而言，愚以为杨文林功不可没。

首先，他是贯穿甘肃当代文学60余年的人物，是甘肃当代文学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创造者、亲历者及见证者。概而言之，他是甘肃文学60余年的活字典、活档案、活化石。说起甘肃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状况及其代表作、代表作品，他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其次，甘肃有一个独异于其他省的情况：先有文学刊物，后有文联作协。甘肃的《飞天》（其前身为《甘肃文学》《陇花》《红旗手》《甘肃文艺》）创刊于1950年8月，而甘肃文联成立于1955年，甘肃作协成立于1958年。“文革”期间，文艺界成为重灾区，是杨文林审时度势，以纪念《讲话》30周年为契机，招集旧部，办笔会（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研讨纪念，创作作品。终使《飞天》恢复出刊，成为“文革”期间省级文学期刊复刊的报春鸟，为数年后甘肃文联作协的恢复打好了基础，储备了人才，积累了经验。每谈及此，杨文林及《飞天》同仁都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再次，在新时期的前10年——整个80年代，杨文林是甘肃文坛最忙碌的人物。他是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飞天》主编。那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大家的心思都用在文艺的事业发展上，没有人说他“擅权”，大家的原则只有四个字：能者多劳。

正是斯时甘肃文联领导班子的团结和谐及全省文艺界的上下齐心协力发努力，使原本处于边缘状态的甘肃的文学艺术，得以蓬勃发展，独树一帜，以其鲜明的个性汇入全国文艺界主流。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在获悉老诗人仙逝的第一时间，我撰写了一副挽联，为亦师亦友亦领导的老诗人杨文林送行，祝他前往天国一路走好——

携笔从戎金刚烈火飞天嫁衣文坛守望润物无声六十载，

老树根深苍龙行南北草南花陇头水泊度信文章晚更成。

——坦荡人生

■赣南笔记·之十

金精洞深藏于翠微峰。出宁都县城，向西北行5公里，见一片峭壁丹崖，石峰林立的群山，便是翠微峰。这里属红层地貌丹霞地形，以峰险、崖奇、洞幽、泉美、水秀著称。南宋文人崔与之曾有诗云，“翠壁丹崖倚碧穹，一壶天地画图”，说的就是这里的奇绝景色。翠微峰分南北两部分。南以翠微峰和金精洞为中心，石峰簇拥，道教盛行。北以青龙岩起，寺庙居多。翠微峰主峰高400多米，峰南有一道裂隙，仅50厘米宽，直通山顶，将翠微峰劈为两块，可谓鬼斧神工。沿裂隙只能一人攀登，上看青天仅有一缝，下看脚底深渊万丈，令人心生寒意。

金精洞由披发峰与石鼓峰相夹而成，是道家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五福地。洞内结构奇特，洞中有洞，洞中有峰。仰头可见一条飞瀑直下，沿一道水槽流入一个葫芦形的石臼，当地人随形赋意，称为“金钱吊葫芦”。这条飞流古时称“灵泉”，水质极好，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用手掬来喝到嘴里，甘冽清爽。唐代末期著名的堪輿家廖瑀，当年入山学道，曾在金精洞居住。廖瑀字伯玉，号平庵居士，宁都黄陂人。因在金精洞修炼，又以“金精山人”自居，世人称其为廖金精。相传廖瑀年方十五已精通四书五经，故乡人又称他为“廖五经”。唐末兵荒马乱，廖瑀科举不中，即随祖父研习堪輿之术，所谓堪，即天道，輿为地道，堪輿也就是风水。廖瑀在金精洞修炼，曾有《怀玉经》《俯察本源歌》及《一盏灯》等著作流传于世。

金精洞外，通向翠微主峰的山路边有一座简约朴素的亭子，名为“怀功亭”。据当地朋友介绍，这个亭子是宁都县政府于1984年所建，意在纪念活捉黄镇中，攻克翠微峰35周年。

黄镇中是宁都的一个惯匪，当年曾长期盘踞金精洞一带。此人又名黄才梯，还有一个名字叫黄辟疆，是宁都长胜乡青茅寨人。他先后当过国民党宁都保卫团长、独立三十三旅旅长、第三战区参议暨宁、广、石、瑞、雩5县联防指挥官等，后来又兼任豫章山区绥靖司令、江西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暨保安司令等要职。当地百姓无不惧怕，都称他为“黄老虎”。1949年8月，白崇禧和何应钦专程来翠微峰，在金精洞召集第八行政区军政要员开会，要求这里加固工事，死守翠微峰。黄镇中遂更加积极地经营此地，聚集2000余众，准备了3年军需粮草，构筑了“可以坚守三年”的永久工事。翠微峰自古堪称天险。金精洞、黄竹寨、马脑寨、大石寨以及观音山等，都是悬崖绝壁，或仅有一道石缝，或一两条沿崖梯道，四周几乎无路可通。关隘险峻，易守难攻，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清初著名散文家魏禧曾在《翠微峰记》中写道：“就使于瓮口砌其阍，三尺童子折荆而守之，虽万夫谁敢进者。”可见，翠微峰的地形是何等险要。数百年来，翠微峰一直被山匪和封建势力盘踞，往往山下稍有风吹草动，便举家迁往这里躲避，据险扼守即可太平无事。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固若金汤的天险，最后还是被攻破了。当时黄镇中将指挥部设在金精洞，洞旁有一道绝壁。黄镇中看到大势已去，倚仗自己不凡的身手，竟徒手攀着长满青苔的湿滑崖壁登上山顶，但最终还是被俘。这面绝壁就在“金钱吊葫芦”的正上方，今天已在岩壁上修起铁梯。但即使攀梯而上，陡峭湿冷的悬崖仍让人有些胆寒。据当地朋友说，上世纪50年代曾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翠岗红旗》，就是根据攻克翠微峰的故事拍摄的。

我已是第二次来金精洞。洞口有一个道观，依崖洞而建。观中有一位道长，几年前我来这里，曾在观中与他闲谈。这次来，他一下便认出了我。我向他请教有关金精洞的事，关于廖瑀当年的一些掌故，便是他为我讲的。道长虽已60多岁，或许是由于长年隐居山里，洞内空气湿润，负氧离子也丰富，看上去仍然面皮白皙，眉目清秀。言语间，也许因为几年前曾有一面之交，我发现道长竟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但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像山泉落到岩石上，虽清脆却又若有若无。这一次，他又为我讲了一个叫张丽英的女人。

张丽英是汉代初年石鼓峰下一个樵夫的女儿。相传10岁时因偶食山中仙桃，顿忘饥渴，面发奇光，体态轻盈飘然出尘，遂来金精洞修炼。后长沙王吴芮征闽经过宁都，闻张丽英仙姿，入山欲强求聘。张丽英回话说，这金精洞岩石能通神仙洞天，你若能凿开一条路，便听由你聘。于是长沙王发兵凿山，洞穿如瓮，果见张丽英被发仰卧于洞天中。众人疑她已死，不料突然紫云涌起，张丽英飞升起来，对吴芮说，吾乃金星之精，岂尘凡能近耶。据志书记载，张丽英时年15岁。至宋代，徽宗诏封张仙为“灵泉普应真人”。

道长讲到这里，微微一笑说，这就是今天的金精洞。

我问，今天的金精洞，是因当年的张丽英？

道长摇头说，也未见得。

他沉吟片刻，又说，或许是金精洞成全了张丽英吧。

这样说着，他又用力看一看我。

下山的路上，突然下起了暴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山里的雨竟是如此规模，似乎整个世界成了一泓巨大的瀑布，山崖都被冲刷得发出震耳欲聋的水声。幸好按计划是在山里吃饭。或许由于大雨的缘故，山里的电路也断了。在悬崖下面的小屋里，点起蜡烛，一边听着外面的雨声吃晚饭，这种感觉也是从未有过的。此时，我又想起金精洞里那个眉目清秀的道长。我想不出，在这样大的雨中，金精洞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牌匾。当年，苏维埃革命时期，小镇上那一扇扇木板的门里面，住着一个怎样的人家？有着一个怎样的人生故事？过去和现在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境遇？

从老街出来，在我回家的马路边上，有一座土山，不高不陡，爬到山顶即能俯瞰小镇。那时，山头上还能看到一个坍塌的碉堡，碉堡的墙上残存着密密麻麻的弹孔，在泥土里还能挖出生锈的弹壳。像是战争年代的遗留物。男孩子都喜欢去那里转悠，我当然也不例外。后来，那座山被农民改造成了层层梯田，田里栽上了茶树，成了四季翠绿的茶山。大雪漫天时，我在那个茶山里逮过野兔。再后来，茶树依然在，只是山顶上被人建了一座烈士纪念馆，塔上镌刻着八个大字：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那个塔，成了小镇的标志物，我天天早晨跑步经过它，都会多看几眼。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军工厂搬迁进城，我家住的房子以及房后一大片水田，被改建成了一个小广场：湃西广场。这是为了纪念皖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刘湃西。我参加工作不久后，曾经拜访过革命烈士刘湃西的家人——刘湃西之子，一个瘦削的乡村小老头。在此之前，我在革命烈士纪念馆曾经看过刘湃西的照片，一身学生装，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英俊威武，剑气逼人。

如今，再回到山里时，我只能朝着我过去的住址凭吊一番。老街已经变得惨不忍睹了。老街的木房中，夹杂着众多的水泥小房……老街于我，已经是一个梦，一个悠长的梦，真实又虚幻，美好又缺憾。

那些古老之物，穿过历史，一路风尘，能与我们相见，实是上苍的垂爱，毁坏了，就再也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印象

老街

□沈俊峰

了，山里热闹了。工厂都建在大山沟里，“靠山、分散、隐蔽”，离镇挺远。人们休息日买点东西，或闲来无事，都会去小镇逛逛。小镇成了方圆几十里的经济中心和人们精神上的乐园。小镇本来就小，突然聚集了那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更加促狭。很快，在离老街不远的地方，人们开辟了一条新街。老街和新街就像两条不相交的铁轨，各呈风采。新街宽阔，柏油路面，路旁栽了笔直的水杉，镇上所有的商店和管事的机构几乎都搬到了新街。甚至在新街的一头，还正儿八经修建起了汽车站。小站每天往省城和地区各发一班长途汽车。那是小镇和外界惟一的呼吸通道。

新街热闹起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老街突然之间就冷清了。但是我却仍然对老街情有独钟，一往情深。通常，我先逛新街，买了本子、铅笔等该买的东西，然后转向老街。从老街的那一端慢慢地走向这一端。老街似乎充满了神秘，总会有一些让人好奇的东西出现，给人以惊喜。

我喜欢老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几乎家家户户的门框上方都挂着“光荣烈属”或“光荣军属”的